

比较文学文库

吴锡民◎著

Bi Jiao Bu Shi Li You
Bi Jiao Wen Xue Lun Gao



比较不是理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文库

比较不是理由

——比较文学论稿

Bi Jiao Bu Shi Li You

Bi Jiao Wen Xue Lun Gao



吴锡民◎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不是理由: 比较文学论稿/吴锡民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比较文学文库)

ISBN 978-7-303-11704-8

I. 比… II. ①吴… III. ①比较文学—研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47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16.25

字数: 22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赵葆坤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1 导 言 比较不是理由

上 编 名家论著

8 第一章 洛里哀的“傲慢与偏见”

17 第二章 “关系”探究图式的现实价值

28 第三章 坚守比较文学的合法性

36 第四章 比较文学之道

46 第五章 来自罗马尼亚“较新”的学术声音

56 第六章 立足于理论要略的示范性阐释

65 第七章 影响研究：从可视到不可视

76 第八章 “法国学派”究竟是怎样的学派

中 编 学科理论

88 第九章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归属的定位

101 第十章 自觉比较意识的共同拥有

113 第十一章 学际沟通原理谏论

124 第十二章 “世界性因素”的“误读”

132 第十三章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

139	第十四章 读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151	第十五章 突破单一文学体系的比较
160	第十六章 关于标准的文学研究话题
171	第十七章 世界文学的概念

下 编 比较案例

180	第十八章 “意识流”流入中国现代文坛论
191	第十九章 “传入”文本与“接受”文本之对读
207	第二十章 两朵绚丽的艺术之葩
216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学与电影
226	第二十二章 西方文学与史学
237	第二十三章 西方文学与科学
247	结 语 比较在于汇通
251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导 言 比较不是理由

一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从它的法国创生地渐变成形于世，仅就其初始享有学科身份的主要标志看，是因为以下学术事件所致。它们是：1877年匈牙利的梅茨尔(Hugo Von Merzl, 1846—1908)在布达佩斯创办了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学报》(后改名为《比较文学杂志》)；1886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波斯奈特(Hutcheson Mcavlay Posnett, 1855—1927)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1897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Joseph Texte, 1865—1900)在法国里昂大学举行了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日尔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把“各国文学的比较历史”正式列入议题；同年瑞士学者贝茨(Lous Paul Betz, 1861—1903)编订了《比较文学书目》。从杂志到专著；从讲座到会议；从书目到……，这些学术事件如今看来业已淡出了学界拿它们说事的视线，但它们毕竟是比较文学学科大厦能够耸立起来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基石。

然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构筑之路并非拥有上述基石的铺垫就预示着“大厦”圆满封顶的到来，可以说它历经了不知多少学术上风 and 日丽的沐浴，同时也遭受过不知多少学术上雷雨交加的洗礼。其中“比较不是理由”的学术震撼弹的威力就令学界难以忘却、寻思不断。法国著名学者、东方学专家、比较文学泰斗艾田伯(René Etiemble, 1909—2002)，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比较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1963年)，从理论上对僵持很久的美、法两个学派论争的孰是孰非问题

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阐发，试图给比较文学指出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在他看来，“历史的演进”和“美学的沉思”不但不对立，而且必须相互补充并结合起来。观察当今国际学界的学术发展，不难发觉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学术 PK（对垒）早已成为了历史，代之而起的学术时尚——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研究”则流行开来。可是，学科“危机”的论调在学界依然不绝入耳（如英国学者巴斯奈特的“翻译说”、美国学者米勒的“死亡说”）。这究竟反映出什么根本性问题？是不是比较文学这门作为国际性的学科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还不太完善，尚不尽明确？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要不然，声称“危机”就是无病呻吟。其实，危机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有“崩盘”忧虑。在辩证认识论上，危机反倒蕴涵着新的生机，而新的生机势必孕生着新的发展机遇，而新的发展机遇则无疑暗示着活力不衰的希望。

不过，对问题的这种理性思辨并不意味着刻意地强化比较文学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所存在的这样或那样不足的合理性，反而激发我们对问题的要害部位乃至方方面面进行不断地寻思和探究。艾田伯声言“比较不是理由”，我们不禁要问：“比较”究竟是什么？依循艾田伯的思维路线（引言[比较文学危机；政治和比较文学]→先决问题：书目和工作语言[书目索引；工作语言；翻译者和翻译]→对象、方法、计划[两个“流派”；历史主义和批评主义；历史主义派；批评派；赋予该学科词汇以更加精确的意义；理想的比较学者；比较文体学太受忽视；还有比较格律学；还有意象的比较研究；还有翻译艺术；还有结构；从文学到比较诗学；想到 2050 年……；研究工作也要重新考虑，要有计划地进行]→结论），我们最终得出“走向比较诗学”的印象，借用法国学者伊夫·谢弗勒（Yves Chevrel）的话来说，这种走向势必“要达到的结果可能是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一种文学理论”^①。倘若我们认同，“比较”在艾田伯看来是企盼实现这样的学术愿景，那么付诸它于运作的理论起点又是什

^① [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王炳东译，17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么？就此，我们乐于用乐黛云教授的“三互”说^①作答。所谓“三互”指的是“互识”（对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欣赏）、“互证”（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的相同或不同的应合，以达到进一步的共识）、“互补”（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中，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他者那里吸取营养，谋求新的发展）。但是起点归起点，它的价值取向惟有落实到批评实践才能进一步得到确证，而确证又务必有赖于理论与方法上的强有力的支撑。否则，互识、互证和互补将会变成货不真价不实的空头学术支票。

二

事实上，21 世纪以来，围绕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国内学界继续引进国外学界中有相当（或一定）学术含量的著作。以我的阅读面而言，其中就有法国学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法国学者伊夫·谢弗勒的《比较文学》，以及日本学者渡边洋的《比较文学研究导论》等。作为一种参照，它们让我们从中窥视到国外学者对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某些更新与完善。比如，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伊夫·谢弗勒（又译为：谢弗雷尔、谢弗奈尔）认为：“属于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对比研究。”^②又比如，关于比较文学中的翻译文学研究，渡边洋认为：“就是指翻译文学给予接受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广义而言就是研究翻译的功过。”^③再比如，关于总体文学，艾田伯认为：“丝毫不应撰写成‘各种运动’的综合历史或总体历史，而是将来可能产生形式理论与类别理论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总体文学应真正重视所有的文学：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无论是马来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5～10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11～12 页。

③ [日]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张青译编，6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文学还是罗曼文学，无论是汉藏文学还是日尔曼文学，无论是土耳其—蒙古文学还是斯拉夫文学。”^①总的来看，国外学者的这些“新近”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大都显得简明扼要，但是对于理论体系的精心打造，他们似乎不太过于讲究。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在新世纪也纷纷著书立说。其中引起学界关注的集体著述就有杨乃乔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该著作从发展论到本体论；从视域论到学派论；从类型论到范例论；从译介论到诗学论再到思潮论，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业内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在书中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我看来，该著作最为出彩的内容之一就是本体论(ontology)和视域论(perspectives)。依我的阅读经验，这是国内外学界首次比较集中深入地论及。著者认为：“一言以蔽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本体就是比较视域(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视域就是比较文学的本体。”“‘视域’是比较文学研究主体对两种文学关系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透视，这种透视的性质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因此在比较文学的专业语境下‘比较’与‘视域’在同义互训的基础上整合为‘比较视域’，从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安身立命的基点——本体。”^②所以，“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③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对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学理的认知与把握，比起艾田伯关于“比较不是理由”中的相关阐发，无疑要来得鞭辟入里。

在个人著述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方汉文先生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洋洋洒洒的“高等原理”足足有 70 万字，恐怕是国内外学界中所有关于学科理论研究的独著中恢宏书写的一部。著者立足于他的“新辩证观念”(基于中国《易经》、《墨经》中的“同异俱于一”的观念与逻辑学基础

① [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11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11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 同上书，117 页。

上,融合西方现代辩证法所创立的一种理论),从对象客体论、主体论、方法论、文本的义理与意向性、文本辞章叙事、文本的考据与阐释学、比较文学史论、比较文论学、文学译介研究、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研讨,试图架构起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以期为中国的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走向世界提供理论范型和模式。关于作者的这种批评实践,其思想观念是否公允在理,理论方法是否切实可行,体系构想是否绵密科学,固然有进一步思虑和探究的空间,但是著者高远宏阔的学术视野、非同一般的理论起点以及奋力开拓的学术气魄,无疑有其眷念不已、掘进不止、自成一家的学术天地。设若“比较不是理由”,那么“比较”应当是什么?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著者做出了他富有学术个性的回答:“要解决不同文学文化的主体间关系,多元化的主体与多元的文学客体间的关系。用当代术语来说,就是自我与他人、主体与文本,文本间性等方面的研究。”^①

三

从异域到国内,从集体著述到个人撰著,我的抽样举例尽管不甚全面,但它们至少可以反映出业内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不断深化与完善所做出的种种新的努力。然而,它们是否全然完美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呢?未必见得。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到底该怎么“化”才不使其本质走样?它究竟有无相对稳定的比较疆界?又比如,渡边洋指出:“比较文学是‘作为整体的文学研究’,研究视野必须面向和文学相关的所有因素,当然包括‘文化’因素,但是研究必须落实在文学上,而不是文化上。在狭义的‘比较文学’中,还有许多应该做的工作,探讨比较文学的结果,就会延伸到比较文化领域。”^②这里提到的“狭义”的比较文学是否意味着还存在与之相对的广义的比较文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

^①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9页,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② [日]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107页。

这种区隔的理论与事实根据又是什么？比较文化是否可以看作广义的比较文学？再比如，伊夫·谢弗勒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探讨的方法，是对各种假设的论证、对文本提出质疑的方式。”“比较文学既是面向别人的活动，也是面向别人的活动的一门学问。”^①对此，我们又作何种解读？谢弗勒的看法真的就没有一点在理之处？等等。

记得乐黛云教授在接受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采访时还强调过比较文学研究的“游戏规则”问题。她认为：“比较文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跨文化或跨学科，另一个是文学研究。举例来说，研究《春江花月夜》是中国文学；研究《春江花月夜》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或同样题材在欧美文学中的表现，是比较文学；研究《春江花月夜》如何表现在音乐、绘画、舞蹈中则是跨学科文学研究。同样，如果谈了很多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理论，惟独没有文学研究，那也不是比较文学。当然，一定要把一国文学内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部分都称之为‘比较文学’也无不可，但这毕竟不是国际上一般所说的，得到大家公认的比较文学。”^②乐教授的这番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较文学好比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倾向在国内外学界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我常常在寻思：特定语境下的“比较不是理由”，果真让人能“演绎”出如此大杂烩般的运作吗？其实，问题多多也不足奇怪。在矛盾论的意义上，旧的问题的解决势必会滋生新的问题的冒出，而冒出在积极的层面上就要加以应对，科学的认识就在这循环往复的意识活动中得到确认或修正或提升。任何自以为是的孙悟空式的腔调无助于贴近事物的本相。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也尝试着以论著的形式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发一发“比较不是理由”的声音。这种发声无意去架构什么理论体系，当然也不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杂音，而是有着它预设的逻辑认识板块，即从名家论著研读到学科理论探究再到比较案例举隅。首先，熟知他者

① [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10、11页。

② 邹建军：《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载《外国文学研究》，2008(1)。



也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该板块立足于择取国外比较文学界中一些领军学者的文本，并(按原版问世时间)对它们逐一进行细读，分别评说其中的得与失。其次，由名家文本层面的圈点过渡到对问题焦点的探寻，则是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然过程。该板块着力围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有待完善或修正的基本问题进行论辩。再次，理论澄清的价值体现在于实践能够得到正确的导航，反过来实践的合法性则给予理论的有效性提供支持。该板块以抽样性的方式，分别出示影响、平行、跨学科三大研究类型的比较案例。通过这样的讨论布局，以期从文本到理论再到实践深刻理解“比较不是理由”的真谛所在，正确掌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运用。

上 编 名家论著

第一章 洛里哀的“傲慢与偏见”

——重读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

洛里哀《比较文学史》中的“结论”，被乐黛云先生的《论多元文化的发展》一文这样来引证：“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界许多人总是顽强地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着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就拿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来说，这种西方中心论就是十分突出的。自从 1886 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 M. Posnett)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专著到 1986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的历史。在比较文学极为兴盛的本世纪 20 年代末，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édéric Loliée)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较文学史》中公开作出结论：‘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山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物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

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现在看来，这样的主张自然是近乎天方夜谭，但在前半个世纪，认同这种思想的比较文学家恐怕也还不在少数；今天它也还蛰伏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灵魂深处。”^①乐先生如此理解的举证，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表明洛里哀的“结论”不外乎西方文化霸权的典型腔调。可是，这种张狂的话语表露与后学过去对该书的阅读体悟似乎有些距离。为了确证，笔者循着洛里哀的思维路线，重新细读了他的《比较文学史》。

一、关于各国文学发展途程之记述

洛里哀撰写《比较文学史》的学术背景，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世界文明日进，各种学问均为显著的发达……”“当18世纪初叶，举谢(Jussieu)创立比较建筑学，从此人类学上的种种发见，给予考古学以极大的辅助。但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考古学，即所谓比较言语学，比较文学，却还没有人着手创造。”^②面对如此现状，作者有意识地提出了他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文学史的职务，是在寻溯种种智识运动的潮流，说明种种潮流的影响，并译述种种努力的形势，备作彼此比较的单位或资料而已。”(315页)持着这样的观念，作者是怎样进行寻溯、说明和译述的？

《比较文学史》有个时间段限定，即“自滥觞至二十世纪”，它表明作者拟在“一切时代和一切纬度的思想的世界里”做一次“长旅行”。这般漫长的途程，洛里哀自称是“辛苦”之旅，可是作者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有着如何进行“寻溯”、“说明”以及“译述”的重点选择。洛里哀认为：“新的史料兀是日增无已；它将不复有这许多时间和地位来纪(记)载所有应该纪(记)载的事实。所以将来的历史必只能做一种极简略的纲要，

①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法]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本章以下凡引自此书的，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只能择几点最要紧的地方和几个最重要的名字来纪(记)载,而将其余比较不重要的一律删除。”(314页)《比较文学史》的实际书写就贯穿了他的这种主张。作者从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的史前史出发,以综合比较分析的笔触,概述“一切时代和一切纬度的思想的世界里”“种种智识运动的潮流”及其影响。诸如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19世纪现实主义等。通过对“种种智识运动的潮流”及其影响的记述,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他眼中的世界各国文学演进的历史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从布局上说,全书共20章,除第1章介绍欧洲文明之前的四大文明背景,第2章讲述印欧文明的分化,第9章述说中古亚洲文学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外,其余17章,即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记述欧洲文学。从这个角度讲,《比较文学史》无异于一部“欧洲文学史”。作为这样一部文学史,它自然成了当今国内一些学人愤懑不平地指责欧洲中心论的事实根据。对此,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洛里哀本人的角度看,他笔下的《比较文学史》之所以偏重于欧洲文学的记述,是因为“我们所能利用的工具又极不完备”(338页),更重要的是,“我们若想把各国文学各各(个)的功绩,加以一种彻底的研究,那我们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们对于那一国的教育,语言,以及国性的影响须先完全明白。我们若想断定各民族对于世界文学的全体确实有多少贡献,确实占得多少的成分,那我们必于那一个民族的特征,它的感兴趣的泉源,它的种族性上以及传统上的长处和短处,它的天性上的倾向,以及由各个作家集合而成的思想的总和等等,先有一种研究。唯其如此,然后可称是一种凭良心的,无成见的研究法,也就是我们所应该采用的研究法。但是这种事业非常复杂,而且叫我们负完全的责任也很危险的。”(326页)作者的这番“辩解”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为此,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认定,洛里哀的偏好是作者本身的知识屏幕和学术视野制约下的记述策略所致,换言之,它是作者为了避免“眼高手低”的稳妥起见而不得不为之的产物。

至于洛里哀的骨子里是不是蛰伏了对东方文学不屑一顾的因子,单

凭《比较文学史》对欧洲文学记述的偏重就一口咬定，恐怕显得有点民族情绪化。因为问题的出现，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固然有“他者”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我们当时自身层面的因素（如本身文化的对外输出、实力乃至影响力等）。然而，不管怎么说，《比较文学史》毕竟没有对东方文学特别是其中的古代文学的一些成就视而不见。即便这些实绩的介绍大都带有“点缀”性质，甚至个别之处的表述也不够怎么准确（如第九章第一节中涉及中国唐代诗人的描述），但是在话语方式上，述说是平和的、中肯的。例如，全书结论部分中的第五小节“东方思想和希腊思想”，作者是这样比较的：“东方诸民族对于诗的趣味其发生比西方诸民族来得自然。所以然者，不但因亚洲各种语言谐和丰富宜于做诗，并因东方诸民族大都和伟大的自然美相接触，故比较容易得着诗的感兴……”（326页）又比如第四章有这样的陈述：“我们即使淡忘了远东孔子诞生之地，那时政治和道德的科学都已发达，而且早已绝无依傍地产出很宏富的文学，内容几乎已是包罗万象——我们即使撇开它说，那末印度，总不致也忘记了。印度自从极古的时代，便有六派各别的哲学，可供后世学者的研究；因这些哲学的逐渐发达，结果便造成一种异常宏富的文学。”（26页）

二、关于各国文学发展印象之概括

《比较文学史》“在一切时代和一切纬度的思想的世界里做了一次辛苦的长旅行”，作者觉得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很深的——即不说是伤感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什么呢？洛里哀作了如下的概括：

首先，作家与作品的命运参差不齐。它们主要表现在：“有的初出现的时候很是黑暗而艰难，但经许多年数之后，便不知不觉之间渐渐得势，而对于将来发生很大的影响。”（309页）“还有的一跃便享大名，却不知不觉之间已在众人称颂声中流于无足重轻之列。从此它们便一些都不留痕迹，只除非一班热心的学者容或希望它们死灰复燃而已。”（310页）“文学史上充满着这种可悲的事迹”（310页）。

其次，历来知识界的大运动均具有相似之处。比如，“一种极普遍

的思想为一切的主宰，而这种思想的种种变态都映照在当时人和作品的历史上。”(316 页)因而，“总有几个要点是彼此可以符合的，这便是人心经验的会合点。因有这几个会合点，结果遂得勒为若干事实的集体和若干思想的组合，以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而这些作品所依凭的心理的元素也即所以构成智识活动的普通原因，并无时代和地域的分别。”(317 页)

再次，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均拥有高远之趣。具体地说，“一种思想和感情也是一切诗和小说所同具的，不论其渊源和时代怎样不同。”(319 页)“古今来各民族所发抒的共同思想，尽可以总括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而从来一切的文学作品无不以模仿人生为起点，因为文学无非是人生的反映而已。”(320 页)“惟是文学的形式，则自来变化无穷，所以然者，无非由作家才情气质不齐的缘故。”(320 页)

最后，各国文学之间相互模仿和影响。“综观世界各国的文学，有的是师，有的是弟，有的是君，有的是臣，彼此间不绝的影响，不绝的反应，纷纷地交换，纷纷的通借，以致庞杂混沌，究不知那(哪)一部分是那(哪)一个民族真正自己创造的。”(341 页)“这是由于现代各国的文明比从前益发增进，而且其间相互的影响也愈加密切，所以褊狭的见解已决不是时代的精神所能相容。”(319 页)更何况，“所谓国界，只不过是一种征收关税的界限，完全出于人为，并无真正区划文化的作用，而散布于地球上的各民族，以有海洋上的商务交通和智识交换故，大家不绝的发生接触，所以从前人的种种区别至此都很觉得无谓了。”(344 页)

洛里哀的这些概括反映出他对一切时代和一切纬度的思想的世界里的“种种智识运动的潮流”及其影响的基本认识和把握。对于这些认识和把握，在现代比较文学学术成果的平台上，它们算不上多么的精当独到乃至无懈可击。例如，在谈论各国文学之间相互模仿和影响的现象时，他声言：“文艺复兴时代则各国都对古人作奴隶的模仿。彼时人人都以为古人的造诣已到极点，所以除模仿他们之外更无别的事情可做了。”(342 页)这话说得有些欠分寸了。又比如，在述及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参差不齐的问题时，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于“书籍的过度增加”(314 页)，这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不过，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上的缺憾